

师范生中学鲁迅语文教学的学术转化能力

葛体标 (Ge Tibiao)¹

摘要：中学鲁迅语文教学对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国民道统的建立意义重大。师范生是勾连大学前沿学术和中学语文教学的桥梁。如果师范生能将大学前沿的鲁迅研究成果转化为中学教学实践，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学鲁迅的教学水平。师范生可以引入文章学视野充实文本细读，可以勾勒中学鲁迅的整体精神图景以突破单篇阅读的局限，还可以通过比较阅读的世界性眼光确立鲁迅的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师范生；中学鲁迅；语文教学；学术转化

Title: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eaching Lu Xun's Works in Secondary Chinese Education

Abstract: Teaching Lu Xun's works in secondary Chinese educ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students' character and establishing the moral tradition of the nation.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serve as a bridge connecting cutting-edge academ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with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If they can transform the latest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on Lu Xun into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practices, it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teaching level of Lu Xun's work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They can enrich close reading by incorpo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essay composition theories, outline the overarching spiritual landscape of Lu Xun's work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text reading, and employ a global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ffirm Lu Xun's significance in a worldwide context.

Keyword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Lu Xun's Work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Chinese Teaching;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鲁迅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对现代国民思想道统的建基，还是对现代国民人格的塑造，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接触了鲁迅研究的前沿成果，当其毕业后就可以逐渐承担起更新中学鲁迅语文教学的重任。对于师范生的培养，以往主要关注的是挖掘鲁迅作品的语文意义。如果能够引导师范生将前沿学术运用到教学中，可以突破思维定式，大大开阔中学生的视野，激发中学鲁迅语文教学的活力。

新时期以来涌现了许许多多的鲁迅研究成果，有以王富仁、汪晖、钱理群等为代表的国内鲁迅研究；也有以竹内好、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人为代表的日本鲁迅研究译介过来。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拓展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思路。我们可以引导师范生有效地将此转化为教学内容，从而打破学术科研与中学教学之间的壁垒。对于师范生的培养，重点不在于要求师范生对鲁迅文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而在于提高师范生将前沿学术转化为教学实践的能力。

¹ 葛体标 (Ge Tibiao)，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鲁迅研究、比较诗学。电邮：getibiao@sina.com。

一、从文本细读到文章学视角

近年来,鲁迅研究的视角已经从文本细读转向了文章学。文本细读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英美新批评。此派认为当时的社会历史批评过于聚焦外部批评,忽略了文学性的内部批评,文本细读是内部批评的落实。近些年以孙绍振、王崧舟等为代表的学者,就格外强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文本细读,这已成为中学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阅读方式了。然而文本细读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它过于依赖英美新批评,忽视了中国本土的文章学传统。

基于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强调一种“文学概论”意义上的纯文学性,而文章学并非如此。鲁迅(2005,第2卷,p.354)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如此写道:“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鲁迅是一个文体学家,他有意进行了文体上的创新,他的文学创作突破了英美新批评意义上的纯文学性。鲁迅的作品具有文章学特征,文体杂糅在散文、小说、杂文之间。他的散文具有小说和杂文的特征,他的小说具有散文和杂文的特征,而他的杂文具有散文和小说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跳出小说、散文等现代西方的文体分类来看鲁迅的作品。

近年来,陈平原、孙郁、刘春勇等学者都试图从这种文体杂糅的文章学视角来对鲁迅进行解读。这就突破了鲁迅教学文本细读的方向。孙郁(2017)说道:“但鲁迅与周作人言及散文的时候,没有像胡适那么单纯,他们还残留着文章学的意识。鲁迅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杂文,其实就是与纯文学的散文理念保持着距离。在他那里,体现的是非文章的‘文章’。”正如孙郁教授所说的,鲁迅的文章是一种“非文章的‘文章’”,与纯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分别。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就表明了他的作品是“旧书上的根据”和“信口开河”之间的调和,他在虚构与写实之间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我们可以尝试以文章学的角度,来解读教材中选编的小说《社戏》。《社戏》(鲁迅,2005,第1卷,p.596)中有这么一段话: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在《社戏》中,主人公也就是叙述者,被称为“迅哥儿”。《社戏》是小说集《呐喊》的最后一篇,文体上属于短篇小说。可是小说的主人公被称为“迅哥儿”。直到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在《狂人日记》中使用“鲁迅”作笔名。《社戏》描述的是主人公幼年的事情,在小说中“迅哥儿”映射的显然是“鲁迅”这一笔名。“迅哥儿”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成为了一个小说人物。那么“迅哥儿”是鲁迅吗?或只是一个小说人物,与鲁迅本人毫不相干?鲁迅用“迅哥儿”这个称呼刻意打破了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距离。“迅哥儿”不可能与鲁迅本人或这个笔名完全撇清关系,由此就从内部瓦解了这篇小说的纯虚构性。然而又不能绝对地说这篇小说是写实,而非虚构。因此这篇小说就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迅哥儿”之间的互文关系,游离在写实与虚构之间,打破了文体的单一性。甚至可以说这篇小说几乎成为了一篇“文章”,而不能以西方现代文体分类的小说概念予以完全概括。

无独有偶,《呐喊》中另外一篇小说《故乡》(鲁迅,2005,第1卷,p.506),也出现了“迅哥儿”: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1919年12月,鲁迅本人确实回乡卖掉了绍兴的老宅,少年时的友人章运水确有来访。因此,

当我们读到小说中的“迅哥儿”三个字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种疑惑：这是鲁迅的自传，还是鲁迅的虚构？我们需要将鲁迅的自传因素和虚构因素摆在一起，来展示《故乡》中文体的交叉问题。这是鲁迅在刻意打破文体的独断性，是鲁迅对西方纯小说概念的抵制。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社戏》和《故乡》中，给中学生呈现出一条关于鲁迅作品的文章学阅读视角。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只是单篇的细节阅读，更是一条打开鲁迅作品的新通道，让中学生意识到中国文学有其自身的文章学传统。

再比如，《孔乙己》也是一篇自我指涉的文章。围绕文中出现的“柜台”，有一个孔乙己在柜台前姿态逐渐往下的趋势。一开始他“站”在柜台前，最后只能“坐”在柜台下。孔乙己的高度逐渐地变矮，以至于低于柜台，这就暗示了孔乙己地位的变化。《孔乙己》（鲁迅，2005，第1卷，p.460）中写道：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这时的孔乙己已经矮于柜台，以至于柜台里的人需要探过柜台才能看到他。这不免令我们想到《呐喊·自序》中鲁迅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2005，第1卷，p.437）

从中可以看出《孔乙己》和《呐喊·自序》之间的互文关系。《孔乙己》是一篇收在《呐喊》中的小说，而《呐喊·自序》作为小说集的自序，是以鲁迅本人的自传口吻写作的。由此可见，对孔乙己低于柜台接受侮蔑的神情的描写，与鲁迅本人在质铺的柜台下接受侮蔑，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进而，我们也可以质疑《孔乙己》文体上的纯小说性。《孔乙己》是否也是一篇介于虚构和写实之间的“文章”呢？它不是一篇纯粹的小说，而有着传记性的投射，鲁迅在孔乙己身上其实暗含了他自己、他父亲和他祖父这些科场鬼的影子，蕴含了一种悼念之情。由此，《孔乙己》成为一篇自我指涉的“文章”。

结合实际的阅读感受，我们会不自觉地把《故乡》《社戏》当作鲁迅的散文进行阅读，可是这些作品却收在小说集里。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感受到了散文的特质，同样我们在鲁迅的散文中也感受到了小说的特质。藉由这种阅读时真实感受和虚幻感受之间的混杂性，能够直接体会到鲁迅作品的文章学视角。师范生应当掌握这一学术研究前沿，以便可以将作者本人既介入小说又退出小说的叙述悖论展示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进入这种双重性的阅读体验。

鲁迅一方面要介入文本，另一方面又要退出文本，这种叙述的悖论构成了鲁迅文章的独特之处。鲁迅文章展示了一个反思、犹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在现代的“文学概论”意义上的文学，要么过度外在于叙述对象，要么过度内在于叙述对象，缺乏文章学中介入-退出的余裕。刘春勇教授（2022）将“介入”称之为“浸进去”，而将“退出”称之为“跳出来”。其实，真正的“余裕”，是在“浸进去”和“跳出来”之间、在介入和退出之间的。鲁迅（2005，第3卷，p.16）曾说道：“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鲁迅的文章学视角其实是在追求一种文章的“余裕”。这种“余裕”就是要给小说中的叙述者提供一个介入和退出的空间。就像“迅哥儿”，既可以是小说中的人物，又可以退出小说成为鲁迅本人。这样，我们在阅读鲁迅小说的时候就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仿佛它是鲁迅的自传，仿佛又不是。这种双重阅读体验，正是鲁迅在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中所转化出来的中国现代小说特质。

二、从单篇阅读到把握整体精神图景

师范生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将中学鲁迅选目以整体性的方式予以勾勒,克服单篇看鲁迅作品的局限性,将“中学鲁迅”视为一个整体,进而与鲁迅的思想勾连起来,建立中学鲁迅的精神谱系和精神图景。帮助师范生从宏观上把握中学鲁迅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构成,可以更好地展现其在国民道统教育上的意义。

中学鲁迅课文选目,遵行了循序渐进的原则,顾及了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散文进入小说的进程。这些选目涉及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多种文体,可以较全面地展示出鲁迅的思想。我们需要引导师范生将分布在各年级的鲁迅课文整合起来,思考各文体之间的文章学联系,以整体性的视野高屋建瓴地透视鲁迅思想的本质和精神图景。正如竹内好(2005, p.45)所说的,我们要回到“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因此,克服因年级划分与篇目分散而造成的碎片化,提升对鲁迅的整体性把握,对师范生进入教学和正确引导学生至关重要。

第一,鲁迅对童年和求学阶段的“非意愿记忆”。教材选编了《朝花夕拾》中的诸多篇目,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藤野先生》等。鲁迅的回忆不只是进行有意识的记忆,而且存在着一种“非意愿记忆”。藉此,我们可以找到将鲁迅的回忆散文视为一个整体的透视视角。

鲁迅(2005,第2卷,p.235)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如此说道:“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鲁迅表明《朝花夕拾》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可是并非费尽心机地自主寻找的,而是不由自主地被端到鲁迅面前的,因此鲁迅将它称之为“思乡的蛊惑”。鲁迅没有主动地想要去掌控自己的记忆,以达到自己的叙述目的;相反,他是被思乡中的“离奇和芜杂”所引诱,以至于这些记忆不由自主地闯入了他的脑海,他只能将它记录下来。可见这是一种被动性的记忆。

张旭东教授(2022)说道:“这种味觉(或许还包括嗅觉)上的‘旧来的意味留存’,以其身体性的‘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成为一种主观经验和内心影像的最后的保留地和庇护所。”师范生在进入《朝花夕拾》文本的讲解时,就可以使用“非意愿记忆”的视角来进行解读。“非意愿记忆”来自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后来被德国思想家本雅明进一步阐发。本雅明(2008, p.216)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中说道:“难道‘非意愿记忆’,即普鲁斯特所说的*mémoire involontaire*不是更接近遗忘而非通常所谓的回忆吗?”本雅明认为这些回忆更像是遗忘,所以它是松散的,难以辨认的。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它是一种“闪烁”,是一种“离奇和芜杂”。

师范生在《朝花夕拾》的教学过程中,不妨引导中学生体会这种鲁迅式的“非意愿记忆”,使其明白真正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童年趣事,并不是我们有意记住的,而是“闪烁”在我们内心中的。师范生引导学生培养这种鲁迅式的记忆,也就是“非意愿记忆”,既可以让学生明白鲁迅把握到的“离奇和芜杂”,又可以激励学生寻找他们自己的“离奇和芜杂”,也就是他们自己脑海中的“闪烁”。

第二,鲁迅的记念与被记念,尤其是鲁迅的安魂叙事。在这一方面,教材选了《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记念横死者的名篇。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引导师范生去呈现鲁迅文学世界中对亡者的记念。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始终是以一种内在的歉疚感来写作记念性文章的。他一直都肩负着一种对亡者的责任,并且受到亡者持久的凝视。我们可以对比鲁迅对他人的记念与他人对鲁迅的记念(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以此思考这种记念上的差异,从中体会鲁迅独特的安魂叙事。

张承志(2015, p.230)从鲁迅文学的开端来理解这类记念性文章的缘起:“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张承志将鲁迅置于日本时期光复会的活动圈中,将秋瑾、徐锡麟、

范爱农的死与鲁迅的“苟活为作家”对比起来。张承志认为，鲁迅在这些纪念性文章中有一种苟活感，对徐锡麟、秋瑾和范爱农有深沉的愧疚感。张承志将这种愧疚感与鲁迅文学的开端联系起来，认为是那些与鲁迅同时代的亡者的灵魂凝视着他，促使他投入笔墨纪念他们。

张承志（2015，p.231）说道：“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由此可见，鲁迅对他人的纪念是一种安魂叙事。有许多屈死者和冤魂凝视着鲁迅的灵魂，以至于鲁迅需要用文学的方式将他们记录下来，使这些亡魂得到安顿和埋葬。因此鲁迅的纪念文章是对亡灵的回忆和回应，担负着安魂的责任。鲁迅的文章具有非常深入的他者起源，即他是在回应他者中写就的，而非仅用以抒发自己情感的自主性叙事。

对此，陈丹青（2011，p.57）曾论及：“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共赴日本的同乡们相继死去，三一八惨案、左联五烈士中青年的死环绕着他。这些亡灵咬噬和凝视着他的灵魂，以至于如果不将它记录下来，就没有办法将它忘却。正如他的文章标题中所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种亡灵的凝视到了一个地步，他必须将这个灵魂安顿下来，才有可能摆脱这样的亡魂对他的折磨和侵扰。只有被纪念的亡魂，才能不再如此折磨他的灵魂，闯入他的脑海。鲁迅这类纪念性文章起源于安魂叙事，这种内在的歉疚感，塑造了鲁迅别具一格的文体风格。如果师范生能把握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解读纪念性文章。

第三，藉着鲁迅的杂文，思考鲁迅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抉择。与此相关的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等名篇。这些杂文涉及古今中外文化抉择的问题。鲁迅将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塑造怎样的中国人格。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塑造生命和人格，而不是文化上的纠缠。师范生在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认识鲁迅的立人观念和生命意识，从而将中学生的人格教育化于无形。

鲁迅思想的核心就是立人。王富仁先生（1986，p.7）论道：“我们将论证《呐喊》《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描写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王富仁先生认为鲁迅是以思想革命的方式参与了时代，而不是政治革命。而鲁迅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立人，由此展开了诸多的讨论。王得后（2021，p.11）在《鲁迅研究笔记》中论道：“‘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郅元宝等学者则强调，鲁迅从早期开始就有所谓的鲁迅心学：“‘立人’，在根本上就是‘立心’。”（郅元宝，2020，p.4）而高远东教授尝试在“立人”和“相互主体性”之间建立关联：“论文最后把‘五四’新文化的出路，从‘拿来主义’引申至‘互为主体’的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创造的格局，就内含着鲁迅从‘立人’到‘相互主体性’的思想意识之确立、演变的某种启示。”（高远东，2009，p.2-3）

由此可见，鲁迅将文化选择的问题转变成了塑造人格的问题。在鲁迅看来，只有那种没有偏见的主体，才能够在古今中西之间吸收有益的养分，将人立起来。所以立文化的前提是立人，立文化的本质也是立人。正如鲁迅（2005，第6卷，p.41）所说的：“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只有阔放的人格，才能善于对古今中西采取拿来的态度。无论是古今中西，只要对立人有帮助，我们都可以拿来。鲁迅反对主奴关系，反对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主张一种大平等。不是站在弱者的地位上仰视强者，也不是站在强者的地位上蔑视弱者，而是彻底地打破主和奴、强和弱的关系，在大平等中建立没有偏见、开放、有接受力的人格。

因此，鲁迅所持的是一种立人的文化观。师范生可以吸收王富仁、王得后、高远东等学者的观点，建立一种大平等的生命意识。重要的是何种生命，而不是何种文化。只要生命和人格被建立起来，文化的选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相反，如果我们纠缠于文化的古今中西，那么我们有可能因此而忽视了人格的建设和生命意识的高扬。这是对鲁迅文化策略的误解和偏离。我们要引导师范生

在讲解鲁迅杂文时，教会学生以人格建造和生命意识的立场来看待一切文化现象。

第四，藉着鲁迅的小说《社戏》《故乡》《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思考鲁迅在国民性问题上的两种观念，一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二是对国民性中淳朴一面的眷恋，从而摆脱对国民性单向度的认识。

在国民性批判问题上，汪晖教授（2008，p.30）写道：“因此，支配鲁迅的文化态度的，是历史中的人物、思想、学派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外来的）权势的关系如何，他们对待权势的态度怎样，他们在特定的支配关系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的那样作简单的中西对比式的取舍。”鲁迅认为国民劣根性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一种被权力支配的主奴关系，礼教正是这种主奴关系的凝结。这意味着鲁迅并不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格，他认为这是古代君主制长期奴役的结果。既然这不是中国人性格中的天然部分，那么国民性就是可以改变的。解除主奴关系，才能解放国民性。我们需要将国民性问题与权力、礼教问题关联在一起进行讨论。

鲁迅展示了阿Q的无意识或者说本能已经被礼教渗透支配。毕飞宇（2020，p.123）曾论道：“在鲁迅的眼里，阿Q的‘自然文化’也就是‘本体文化’是畸形的、丑陋的、逆天理和反人类的。阿Q的‘恋爱’不涉及情、不涉及爱、不涉及爱的表达、不涉及个性尊严，甚至不涉及性。它涉及的只是礼仪和荒谬，实在是令人无语。”毕飞宇留意到，阿Q的“自然文化”也就是本能部分，也已经被礼教深深地异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阿Q是通过下跪的“礼仪”而非用情爱向吴妈求爱的。毕飞宇对阿Q性意识中的礼教因素的揭示，可谓触目惊心。鲁迅将阿Q的猥亵和下跪并置在一起，表明礼教和猥亵其实并不冲突，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礼教中或许也隐含了一种难以觉察的猥亵。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鲁迅对国民性淳朴一面的探究。鲁迅对这淳朴而伟大的一面，有着深沉的眷恋。王富仁对祥林嫂的评论、钱理群对阿长的探究、汪晖教授对“向下超越”的发现，都让我们看到鲁迅对民间底层的眷恋。王富仁先生（1986，p.471-472）曾精彩地论及祥林嫂：“但在她的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中，在她的性格内涵中，她却远非如此卑下的，她有一颗倔强的、坚韧的、反叛的、无奴性或极少奴性的灵魂。她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宽容和恩赐上，她从未曾阿谀强者，没有奴颜媚骨，总是企图依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自己的困境。”这一解读符合我们的阅读感受。我们读《祝福》时，不忍心批判祥林嫂，相反，我们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民间人格的“无奴性或极少奴性”。虽然她们在礼教的奴役中备受凌辱，却仍然“没有奴颜媚骨”。

鲁迅致力于展示中国民间的这种灵魂样貌。例如鲁迅对阿长的记忆，就饱含着温情和感念，并请求地母接受阿长的灵魂。鲁迅在关于鬼的叙述中就充分表明他对民间淳朴性的肯定，汪晖（2008，p.448）将此称之为“向下超越”。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向上超越”，那么中国的超越则是“向下超越”。鲁迅寻求地母的慰藉，寻求女吊的复仇，眷恋朴素的阿长和受凌辱的祥林嫂，这都是“向下超越”。

由此，我们可以引导师范生借助这些学者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对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展开两方面的讲解，既有对劣根性的批判，又有对淳朴性的眷恋。从而使中学生认识到，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是多面的、立体的，既有对卑怯一面的批判，也有对伟大而淳朴一面的肯定，从而使学生对这片土地和人们建立起内在深沉的情感。

三、从东亚性到世界性

我们还可以借助比较阅读的视野，展现出鲁迅作品的世界性意义。比较阅读的视野，对于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十分必要。将鲁迅作品置于整个中学语文教材的课程群中，使其与教材中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进行多方面的参照，思考鲁迅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西洋文化的回应，可以展示鲁迅的历史性意义和世界性意义，与此同时也就确立了中国现代思想对于世界的阐释潜能。比较视野的引入还可以使学生形成古今中外文学之间互动的意识，使学生跳出对鲁迅作品过于内部的解释，使文本细读上升为观念阐释，同时使观念阐释落实到文本

细读中。

在比较视野中，我们会发现鲁迅思想的世界性。这种世界性首先表现在鲁迅本人对世界文化的接受跨度非常大，鲁迅自己就是一个“拿来主义”的践行者。郜元宝教授反思了竹内好、汪晖等人强调鲁迅的东亚性：“这种鲁迅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初被某些学者表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我当初写《六讲》，也赞许这种观点，但后来发现很难继续认同了。我觉得应该把鲁迅从凝固的、神话性的身份符号中解放出来，在更大的空间来把握他。鲁迅不仅是中国或东亚的，也（或更加）是世界的。”（秦乐淳、顾学文，2020-11-21）郜元宝教授认为以往对鲁迅的研究，忽略了鲁迅的世界性。正如郜元宝教授接着说到的：“其实从《域外小说集》本身看，周氏兄弟‘纂译’作品包括英、美、法、俄等多国文学，东北欧作品占比并不大。”（秦乐淳、顾学文，2020-11-21）看来，我们确实有必要将对鲁迅的关注从东亚性转向世界性。

鲁迅世界性的另一个表现是，他自主地、原发性地开创了东方现代主义文学，展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现代主义。正如查明建教授（2000）所说的：“也就是说鲁迅与 20 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开创者面对的是同样思想资源。《狂人日记》《阿 Q 正传》《野草》等作品完全看成是鲁迅先生的独创，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处在同一个起点上。鲁迅的现代主义作品实际上与同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是单一、机械的影响关系，释放与接受者的关系而构成了对应性的互文关系。从鲁迅吸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而言是影响，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对应性而言则是自我生发。”鲁迅的《野草》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文本，与西方现代主义有交叉、同步的关系。《野草》不只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更是一种源自东方的自主性的创作。它不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嫡传，而是一个对西方现代主义具有重大补充和启发意义的东方现代主义文本。

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如此，它是自主性、原发性的东方意识流小说。吕周聚教授（2018）认为：“严家炎不赞同有人称《狂人日记》为意识流小说，因为‘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西方意识流小说尚未兴起，这篇小说也并不真有意意识流的特质。’严家炎的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意识流小说作为一个流派或概念正式出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这种观点又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作为文体形式的意识流小说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爱伦·坡、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是意识流小说的先驱。”由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确开创性地形成了一种东方意识流小说。

无论是《野草》，还是《狂人日记》，鲁迅都展示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现代主义。这种东方现代主义对西方提出了挑战、批判、反思和补充。与西方现代主义相比，鲁迅的东方现代主义有哪些独特性呢？其一，鲁迅在文体上所具有的文章学特质，突破了文体的界限，鲁迅将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现代主义化了。其二，叙述者视角在进退之间，叙述者既在文本之中，又在文本之外。鲁迅采取了一个在文本中出入自如的叙述者。这样的叙述者瓦解了文本自身的完满性，使文本产生出自我批判的特征。这是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反讽。其三，鲁迅的东方现代主义文学尤为强调安魂叙事，从而使他的文学成为对虐杀事件的介入，并且这种介入存在着基于歉疚的悖反性，展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担当意识。这就是鲁迅式的、东方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的视野和补充。

鲁迅的创作表明了现代主义不只是西方的，还可以是东方的，甚至是世界的。正如史书美（2007，p.3）所说的：“现代主义一直被描述为一个从西方向非西方（然而事实上却是现代主义的起源地）的移动过程。人们从未对大都会西方的源头地位提出过质疑，现代主义成了西方获得凌驾于非西方之上的文化权力的动力来源。于是学术界迫切需要一种立足于地缘政治层面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来对此进行审视。……现代主义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单向的旅行，这也就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话语层面的不平等。”根据史书美的观点，东方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起源地之一，并非只是被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地方。

在比较的视野中，我们引导中学生认识到鲁迅是世界的。东亚性表明一种区域化的独特性，展

示东亚的特殊性，它有自己的道路和方式。可是若我们只强调东亚的特殊性时，也会遮蔽东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当我们强调鲁迅是东亚的、中国的，我们是否限制了鲁迅的世界性意义，忽视了他的普遍性呢？鲁迅所代表的东亚现代性，不能被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内，而要走向普遍和世界。东亚现代性本身就应当有一种新的世界性和普遍性。这种世界性眼光，可以使我们更深地把握鲁迅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以及他对现代性的贡献。如果师范生能将这种世界性眼光引入课堂，将会对中学鲁迅的教学带来极大的提升。

结语

本文从以上三个转向论述了如何帮助师范生在中学鲁迅课堂上将学术转化为教学的能力。师范生一方面身在大学课堂之中，对学术前沿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前往中学进行语文教学的明确导向，因此就成为有效勾连中学和大学之间的桥梁。所以，在对师范生的培养上要格外看重他们的学术转化能力。当他们将学术前沿具体地落实到中学教学中时，前沿的学术成果就脱离了过度抽象的运作方式，同时也使中学生得以在课文的文本细节中体会前沿的学术观点。这样就实现了从具象到抽象、从文本到观念、从中学到大学的提升。因此，我们对师范生学术转化能力的训练刻不容缓。只有将这种能力提升起来，我们才能整体地提高中学鲁迅教学的水平，同时使前沿学术成果落地。

钱理群教授为此做了突破性的尝试。他曾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了“鲁迅作品选修课”，后来出版了《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和《中学鲁迅阅读选本》。钱教授就是以中学生为受众，全面传递了他在高校研究中的成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有人以钱理群教授的尝试为研究对象，探讨“从学界到语文界”的转化：“一方面，鲁迅研究学者如何有效参与到中学教育中去，让新的鲁迅学术研究成果有其转化与普及的应用空间；另一方面，中学语文教师应积极关注鲁研界的研究成果，并及时把它们有效吸收、化用到中学教学中去。”（李莹，2019，p.15）。当我们帮助师范生实现这种学术转化能力时，就意味着将高端的学术转化成了学生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表达，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素养。这种转化能力的培育正是卓越教师的培养模式，它打破了高校与中学教育之间的壁垒，使两者有效地互动起来。

基金项目：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文性视野中鲁迅的世界性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24BZW115）；2022 年宁波大学教师教育专项研究重点项目“师范生鲁迅作品教学中的文本细读和学术转化能力研究”。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毕飞宇（2020）：《小说课（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Bi Feiyu (2020). *Lectures on Fiction (Revised Editio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陈丹青（2011）：《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Chen Danqing (2011). *Casual Conversations About Lu X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郜元宝（2020）：《鲁迅六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Gao Yuanbao (2020). *Six Lectures on Lu Xun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 秦乐淳、顾学文（2020 年 11 月 21 日）：“研究鲁迅，关键是要努力开掘‘灵魂的深’”（专访郜元宝），《解放日报》，第 005 版。
- [Qin Yuechun, Gu Xuewen (November 21, 2020). "Studying Lu Xun: The Key Lies in Striving to Explore 'the Depth of the Soul'"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Gao Yuanbao), *Liberation Daily*, Edition 005.]
- 高远东（2009）：《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 [Gao Yuandong (2009). *How to "Take" in Modern Tim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Lu Xun's Thought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刘春勇（2022）：“鲁迅对中国传统‘文章’创造性转化的两种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07）：180-202。
[Liu Chunyong (2022). “The Two Paths of Lu Xun’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cl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07):180-202.]
- 鲁迅（200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Lu Xun (2005).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李莹（2019）：《从“学界”到“语文界”——“鲁迅研究”在中学鲁迅教学中的转化与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Li Yin (2019). *From “Academic Circles” to “Chinese Teaching Circl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u Xun Studies” in Secondary School Lu Xun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吕周聚（2018）：“论《狂人日记》的现代主义文体特征”，《鲁迅研究月刊》（09）：27。
[Lü Zhouju (2018). “On the Modernist Stylistic Features of *A Madman’s Diary*.”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09): 27.]
- 史书美（2007）：《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Shu-Mei Shih (2007).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Translated by He Tian.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孙郁（2017）：“非文章的‘文章’——鲁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04）：114-129。
[Sun Yu (2017). “The Un-Essay ‘Essay’: Lu Xu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Concept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04):114-129.]
- 竹内好（2005）：《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Takeuchi Yoshimi (2005). *Overcoming Modernit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本雅明（2008）：“普鲁斯特的形象”，《启迪：本雅明文选》，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Walter Benjamin (2008). “The Image of Proust”. *Illuminations: Selected Writings of Walter Benjami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王得后（2021）：《鲁迅研究笔记》，钱理群选评。商务印书馆。
[Wang Dehou (2021). *Notes on Lu Xun Studies*. Selected and reviewed by Qian Liqun. The Commercial Press.]
- 王富仁（1986）：《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ang Furen (1986). *A Mirror of the Anti-Feudal Ideologic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汪晖（2008）：《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Wang Hui (2008). *Resisting Despair: Lu Xun and His Literary World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张承志（2015）：“鲁迅路口”，《一册山河·谁是圣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Zhang Chengzhi (2015). “At the Crossroads of Lu Xun.” *In A Volum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 Who Is the Sage?*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查明建（2000），“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中国比较文学》（02）：35-51。
[Zha Mingjian (2000). “Re-examining 20th-Century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from 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With a Discussion on Influence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02): 35-51.]
- 张旭东（2022）：“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朝花夕拾》与杂文风格发展的缠绕”，《文艺研究》（04）：69-85。
[Zhang Xudong (2022). “Flickering Memories on the Wandering Path: The Entanglement of *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and the Evolution of Essay Writing Styles.”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04):69-85.]